

第 六 卷

中國現代教育家傳

陳雲

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编委会编

中国现代教育家传

第六卷

湖南教育出版社

中国现代教育家传

第六卷

《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编委会编

责任编辑：曾 卓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展览馆路8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316,000 印张：13.875 印数：1—1,830

ISBN 7—5355—0263—6/G·263

统一书号：7284·956 定价：4.35 元

出版说明

一、本书编委会聘请专家及部分作家、记者，选择自“五·四”运动至今的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将其业绩撰写成传，汇集出版。选择的标准是：在教育实践或教育理论上有重要贡献，对现代中国教育事业的建立、发展起过重大作用。本书所记述的内容真实可靠，评价客观公正，很多资料系第一次公开发表，弥足珍贵。它系统地介绍了各教育家的教学实践及理论观点，可供现代史学工作者、教育史和教育理论工作者及广大教育工作者参考，亦可供师范院校师生作课外参考书用。本书在写作上力求生动形象，具有可读性。读者可以通过本书得到历史知识，学习教育家们的动人事迹和治学、成才的经验。

二、本书将分辑出版，对港、台教育家除已收录者外，也留有适当名额，并陆续进行汇集。全书各教育家传收入的次序按收稿及编辑完毕的时间先后排列；同一辑中则按各教育家的出生年月先后排列。

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使全体编写人员受到很大的鼓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周谷城教授对本书的编写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具体的指导，并为本书写了序言。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很多教育界前辈及其亲友，全国很多部门、很多地方的同志的热情支持与指教，谨在此一并致谢。

四、本书中有二十一位教育家的传记，曾经以《科学与人》丛书的名义结集出版，本社此次出版时，已将其内容作了修订和调整，另行分辑，特此附加说明。

五、由于编者理论水平及历史知识有限，且限于其他条计，因此难免不有缺点及遗漏之处，敬请方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序

周谷城

自1919年起到今天，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十五年，我国教育工作者培养了大批人才，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些教育工作者中间，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教育家，他们是我国教育工作者的代表，他们的贡献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可以引以自豪的宝贵财富。搜集他们的事迹，给他们立传，使他们昭著于世，这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看一看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的中国现代史，就会发现，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教育界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最早研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教育工作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有好几位是教师；“五·四”、“三·一八”、“一二·九”等重大革命运动都是从学校发动起来的，北京大学、黄埔军校、抗大、陕北公学等在中国革命中更是占有突出的地位；很多老一辈革命家、文化战士都曾从事过教育工作，有些人同时就是杰出的教育家；很多职业革命家是从学校走上革命道路的。新中国成立后，又有一批职业革命家成为教育家。中国现代教育史在整个中国现代史中

DB90/15

占有突出的地位，这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特点。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史，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惜，这一点至今尚未引起史学界足够的重视。我们对现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非常不够，至今还没有一部权威性的、较系统、叙述较全面的中国现代教育史专著。编写中国现代教育家传，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史，进而深入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特点，将会在提供线索、搜集资料等方面起一定的作用，无疑是一项必要的工作。

今天，发展教育事业对建设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国家的重要作用，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把解决教育问题列为四化建设的战略重点，这是十分英明的决策。跟一些工业发达、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相比，我国的教育事业还比较落后，很多方面还不能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在新的形势下，我国教育事业面临着新的任务，要按照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进行改革，加速发展。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离不开教育科学理论的指导。然而，我国教育科学理论的研究还比较落后。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教育科学理论体系。我们的一些教育实践、措施，由于缺乏科学理论依据，有很大的盲目性，造成很多失误。可以说，教育科学理论研究的落后，反过来成了造成我国教育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理论研究落后不等于没有理论。“五·四”运动至今，我国教育工作者培养了那么多的人才，不仅培养了大批革命战士和各种建设人才，也培养出了不少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专家学者。这里就有许多的成功经验，蕴藏着丰富的教育思想。我们不少教育家在教育理论方面也作了许多探索和研究，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问题是，从整体来看，我国教育工作者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比较分散，散见于他们各自的实践、经历之中，缺乏综合和系统深入的研究，

没有形成有我国特色的理论体系。现在，在选择一批在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理论上具有重要贡献的教育家，搜集、整理他们的事迹和教育理论观点，编成他们的传记，这一工作，对于研究、建立我国现代教育科学理论体系，是不可缺少的。

《中国现代教育家传》计划收入一百多位教育家的传，分册出版。至于选择标准，本书编者提出如下的意见：在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上具有重要贡献，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建立、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教育工作者，均将考虑收入本书。此外，材料搜集的范围、评价、编写的体例等方面，为条件所限，暂不十分苛求。相信这样作仍不失为一部有参考价值的书。希望它的出版，对中国现代教育史和教育科学理论的研究能引起更为广泛的重视。

目 录

1	鲁 迅	余章瑞
67	周诒春	黄延复
88	钱 穆	张志哲
121	苏步青	王增藩
145	江隆基	苗高生
172	王企贤	陈 模
189	李 桦	张作明
208	段力佩	陈圣来
236	钟师统	王一凡
253	钱令希	孙懋德
281	吴宝康	陈贤华
307	韩作黎	赵尊党
325	钟期荣	芝 茵
356	谢希德	罗苏文
373	韦 力	宋守中
398	仓孝和	周学谨等
423	毛蓓蓓	肖关根

余章瑞

鲁 迅



鲁迅，1881年9月25日（夏历清光绪七年辛巳八月初三日）生于浙江绍兴府城内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取名樟寿，后改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时用的一个笔名。

接受传统教育时期

鲁迅7岁入家塾，从远房叔祖周玉田先生读《鉴略》。这是一本简要的中国历史读本，文字深奥，让7岁的孩子读这样的书，实在是很难懂也很乏味的。可是那时学生除了这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对字的课本之外，桌上不许有别的书，这种枯燥的学校生活，使鲁迅很不习惯，也颇反感。

家庭教育也很严格，无非是教孩子死读熟读书本。一天清早，家里人正准备带鲁迅去看迎神赛会，航船已泊在河埠头，饭菜和点心盒子已经搬上船了，他笑着跳着，催大家快些。忽然父亲站在背后说：“去拿你的书来！”“给我熟读，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

鲁迅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有什么法子呢，只好是读着，读着，强记着。这件事给他的印象太深了！后来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抨击了封建教育制度和封建家长制对儿童身心的摧残。

保姆长妈妈送给他一本有图画的《山海经》，使他惊喜不已。从此，他注意搜集画书，陆续有了石印的《尔雅音图》、《毛诗品物图考》、《点石斋丛画》、《诗画舫》、《海仙画谱》等书。家中有三箱藏书，他一放学就翻出来看，先看画书，再看字书。七八岁时就看了《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也读了白居易、陆游和李白等人的诗词。

鲁迅10来岁时，一位长辈送给他一本《二十四孝图》，是希望他当个孝子。一看是画书，鲁迅很高兴，但一接触内容，什么“老莱娱亲”呀，“郭巨埋儿”呀，尽是些不近人情的荒诞故事，对此他既反感，又担心，担心真要他当那样的孝子。这在他的心里埋下了对传统教育怀疑和不满的种子。

12岁那年，鲁迅到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读《诗经》。每天的功课是听讲、背书、习字、对课。学习生活单调而枯燥。鲁迅和同学们常乘老师不注意，溜到后园去折腊梅，寻蝉蜕，捉苍蝇，喂蚂蚁。鲁迅幼年很喜欢草木虫鱼，也爱读讲自然界知识的书。他在课外读过《释草小记》、《释虫小记》、《南方草木状》、《广群芳谱》、《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花镜》等书。他种过映山红、月季、石竹、万年青、蝴蝶花等花草。还对照书本，鉴定花草的名称和习性。每获得一种新花草时，就在花盆上插上竹签，标上名称，写明品性。他能通过自己的观察，修正前人著作中的讹误。如《花镜》中说：“映山红须以本山土壅始活。”鲁迅以自己的实践批注：杜鹃花“性喜燥，不宜多浇，即不以本山土壅亦活。”鲁迅的这些活动，养成他对生物学的兴趣，他日后在两所师范学校教生

物学，也和他从小的志趣有关。

鲁迅是个勤奋好学的人。有一次因家里有事，上学迟到了，老师批评了他。他很后悔，就在桌子的右上角，刻了一个“早”字，用来提醒自己。

1893年，鲁迅祖父周介孚因科场作弊案被捕入狱，鲁迅和家人到皇甫庄外婆家寄居，归来后虽仍去三味书屋读书，但又因父亲久病卧床，鲁迅要为他请医生，寻药引，去当铺，跑药店，所以经常辍学，只能“遥读”。1896年，鲁迅父亲病逝，家境从小康坠入困顿。鲁迅开始接触社会一些阶层的群众，体察到世态的炎凉，尝到了人世的艰辛，也增进了对社会的认识，提高了观察社会的能力。

鲁迅有位叔祖周椒生，在南京水师学堂当“管轮堂”监督。鲁迅要跟他到南京去上学了，母亲把筹集到的八元路费交给鲁迅，说是由他自便，就伤心地哭了。

1898年5月7日，鲁迅到了南京；5月24日，考取了江南水师学堂的“试习生”，后进机关科学习。周椒生给他改名为周树人。

水师学堂是个封建制度顽强统治的学校，鲁迅后来对它的评论是：“总觉得不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这不合适来。现在是发现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其可也。”于是只得走开。1899年进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学习矿业。在这里，他学格致(博物学)、地学(地质学)、金石学(矿物学)，也学德语，看《全体新论》、《化学卫生论》。严复译的《天演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出版了，鲁迅在一个星期日特地跑到南城买了来，一口气读下去。他在这时接触到维新和物竞天择的进化思想。周椒生得知侄孙读这样的书，说：“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可是鲁迅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俸饼、

花生、辣椒，看《天演论》，读《时务报》。鲁迅在矿路学堂期间下过矿井，同中国最早的一些产业工人有过接触。

1902年1月，鲁迅从矿路学堂毕业。其时清朝政府决定派五名学生到日本去留学。矿务班有两人，其一便是鲁迅。3月24日，鲁迅从南京乘大贞丸轮船出发，4月4日到达日本横滨，7日到东京，下旬进弘文书院普通科江南班，开始了留学生活。

取别国的火来锻烧自己

鲁迅到日本的这一年，正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一年。在东京，聚集了一大批反清革命志士，留日学生也卷入了革命浪潮。

这年春天，章太炎、秦力山、冯自由、马君武等发起“支那亡国纪念会”，并撰文昭告国人，极为沉痛，如：“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我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也很激动人心。章太炎写的《张苍水集后序》，表示了誓不与清政府同载天日的激情，是鲁迅所爱诵的，该序末段云：“余不得遭公为执牧圉，尤得是编丛杂书数札，庶几明所乡往。有读公书而尤忍与彼虏终古者，非人也。”这一时期，鲁迅与浙江革命机关广泛接触，积极参加各项革命活动，经常“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

1903年2月，鲁迅剪去了象征种族压迫的辫子，拍了一张“断发照”，题诗送给许寿裳。鲁迅还进弘文学院讲道馆，学技击，学柔道，锻炼身体，俾便以身报国。他同情章太炎反改良派的斗争，表示：“改良必败，暂做革命的骁将。”同学们钦佩地说他：“斯诚越

人也，有卧薪尝胆之遗风。”

鲁迅虽身在日本，仍很关心国内的教育问题。由于他对中国封建教育的腐败落后有过体会，所以很重视教育的作用和改革。1903年初，鲁迅与陶成章等27个留日学生给绍兴公众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我中国空疏陈迂之教育，必不能敌各国之教育。”呼吁家乡青年，冲破障碍，到日本学习新知识，接受新教育，寻求救国的理论和途径。

1902年11月，浙江籍留日学生101人在东京组织浙江同乡会。1903年2月17日，由浙江同乡会杂志部办的月刊《浙江潮》在东京创刊。《发刊辞》说：“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魂，发大声于海上。”这份宣传反清的革命刊物起初由孙江东、蒋百里主编，第五期起由许寿裳主编。他向鲁迅约稿，鲁迅第三天就送去一篇《斯巴达之魂》，这是他编译并改作的，他在文前的短序中说：“迄今读史，尤慷慨有生气也。我今掇其逸事，贻我青年。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幗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

1903年10月，鲁迅在《浙江潮》第八期发表《中国地质略论》一文，介绍我国地质分布及矿产蕴藏情况，赞美“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并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检；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覬覦者也。然彼不惮重茧，入吾内地，狼顾而鹰睨，将胡为者？”面对帝国主义列强“伸手如箕，垂涎成雨，造图列说，奔走相议”，我们怎么办？鲁迅很风趣地说：“小儿见群儿之将夺其食也，则攫而自吞之，师是可耳。”他认为，我们是中国的主人，只要“结合大群起而兴业，群儿虽狡，孰敢沮者，则要索之机绝。”这虽是一篇介绍地质矿产的科学知识文章，却洋溢着作者的爱国主义热情。

1909年7月，鲁迅与顾琅合作的《中国矿产志》由上海普及书

局出版。该书正文之前，有当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马良(相伯)写的序。序中说，此书“罗列全国矿产之所在，注之以图，陈之以说，我国民深悉国产之所有，以为后日开采之计，不致家藏货宝为他人所攘夺，用心至深，积虑至切。”这一说法是很符合鲁迅等编著是书的原意的。

在《中国矿产志》中，鲁迅等用一章的篇幅揭露帝国主义者盗窃我国矿藏资料的罪行。如1871年德国人聂何芬在我国十多个省进行了三年调查，行程两万多里，写了三大册报告，说：“支那大陆，广蕴煤炭，而山西尤多。然矿业盛衰，首视输运，惟胶州，则足制山西矿业之死命，故分割支那，以先得胶州为第一着。”德帝国主义的魔爪果然先伸向了胶州湾。鲁迅列举许多省的矿产资源，指出了这些宝藏久为美、德、日、法等列强垂涎的事实，要国民留意。

《中国矿产志》书中附有一张《中国矿产全图》。这张图的得来，初看很偶然，实际是鲁迅随时留意搜集资料的必然结果。有一次，鲁迅和一位同学在一位日本教师那里意外地见到一张《中国矿产全图》。这张图是日本农商务省地质矿山调查局的秘本，对《中国矿产志》的编写颇有价值，便商借回来，连夜描画，把它放大十二倍，印在书中。

鲁迅还用他刚学到的日语，翻译了两本科学小说，一是美国培仑作的《月界旅行》，一是法国儒勒·凡尔纳作的《地底旅行》。他译这两部作品的目的在于普及科学知识，进行启蒙教育，“导中国人群以进行”。他在《月界旅行·弁言》中说：

“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

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我邦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1904年4月，鲁迅在弘文学院毕业。9月，入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医学。从他10月给蒋抑卮的信中，可以看出他这时的思想情况：一是对祖国的思念和忧虑，一是对学校教育方法欠佳不满，从中亦可略窥鲁迅教育思想的一斑。信中说：“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对一些日本学生青年，鲁迅说：“略一相度，敢决言其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惟社交活泼，则彼辈为长。”表示了一种乐观自豪的气概。在信中还两次谈到学校功课太紧，教育方法是一味的灌输，不容学生思索：“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修习未久，脑力顿涸。四年后，恐如木偶人矣。”信末又说：“而今而后，只能修死学问，不能旁及矣，恨事！恨事！”表示了他要求一种开放式的启发学生主动思维的教育思想，也隐伏着日后他弃医从文的契机。

鲁迅在仙台医专学习很刻苦。他努力听讲，记笔记，在教解剖学、骨学的老师藤野严九郎先生等的耐心教育帮助下，他的功课较好，以致受到一些日本同学（留级生）无理猜疑，说是藤野先生事先向鲁迅泄漏了试题。在这些人看来，中国是个弱国，弱国的青年必定智力也低下，居然考及格，想必是教师徇了情。鲁迅感到屈辱。第二学年上细菌课时，鲁迅看了一场纪录片，有中国人被斫头和一群中国人围着看的镜头，一些受军国主义思想影响的日本同学则雀跃鼓噪。这对鲁迅刺激很大，因而思想起了变化。他学医原是想毕业回国后，救治象他父亲那样被误的病人，战争

起来就去当军医，也用医学科学知识促进国人的维新思想，因为他知道新医学对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帮助。这时他觉得医学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件很紧要的事，如果一个人思想没有觉悟，即使身体很健壮，也只能做被枪毙的材料，或者成为精神麻木的“看客”。他感到，第一紧要的是改变人们的思想，而能改变人的思想的，首推文艺。于是他毅然告别了对自己抱有良好愿望的老师藤野先生，离开了仙台医专，回到东京。他一面筹办《新生》杂志，一面撰写一系列企图改变人们思想的文章，并投身到革命浪潮中去。

1907至1908年，鲁迅写了《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和《文化偏至论》四篇论文，先后在刘师培等编的《河南》月刊发表。鲁迅在这些论文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意见，就是要救中国，必先“立人”。而“立人”必先进行思想启蒙，以提高人的素质，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改造国民性的落后部分。鲁迅这时已经认识到，要做到这点，光有良好的愿望不行，而必须冲决旧思想、旧传统、旧礼教的网罗，进行反封建的思想革命。鲁迅针对当时有志者纷纷到国外寻求救国之路，指出：学习外国，如果不触动旧制度，不进行人的思想观念的改造，不唤醒群众的觉悟，是没有抓住根本。他在《文化偏至论》中明确提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人既发扬踔厉矣，而邦国亦以兴焉。”救国先要提高民众的思想水平，“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发国人之内曜”，“扬宗邦之真大”。这样就能使“沙聚之邦”，“转为人国”。“立人”的思想，是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可以说就是他教育思想的核心。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他讨论三个相关的大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

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并说，鲁迅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这也说明鲁迅努力追求的目标就是“立人”，教育人，提高人，从而建立“人国”，即建立新人的国家。为达到这个目标，需要进行斗争，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火与剑的斗争，即无产阶级革命；所希冀建立的人国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皆是他在以后的革命实践、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中逐步明确起来的。

1909年7月，鲁迅母亲来信催他回国，二弟结婚也希望他经济上有所帮助，于是鲁迅结束了他8年的日本留学生活回国了。

教育战线初露锋芒

1909年8月，鲁迅回国后第一个职业就是教师。他应友人、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学许寿裳的推荐，任该校初级师范化学教员和优级师范的生理学教员，还兼任日籍教师铃木珪寿的课堂翻译和助教。鲁迅每周教课时间在20节以上。

为了讲课需要，鲁迅编了两部讲义：一部是《化学讲义》，一部是生理学讲义《人生象教》，油印发给学生。鲁迅注意传授新的科学知识，在讲生理卫生学时，并不回避生殖系统的知识，为此还专门编写了“萆殖系”一章，讲了生殖原理和胚胎形成的科学知识。这在清末的封建礼教宗法制度统治下，是需要科学的勇气的。全校师生对此都感到惊奇，但鲁迅在课堂上坦然地讲，只要求学生在他讲课时不要嬉笑。他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